



綜合統籌應對 解除鉛水危機

自從啟晴邨爆發鉛水事件以來，不少香港市民人心慌慌，一些政治人物更藉此進行政治煽動，有媒體大肆炒作，等等。此事似有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之勢。為了應對食水含鉛事件，繼發展局就供水鏈成立專家小組追查起因後，房委會昨宣布成立一個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質量檢驗及工程監管。鉛水危機由專責小組調查跟進，相信有助盡快查明真相，然後才可對症下藥，繼而完善日後之監管工作。

的確，究竟哪裏出錯導致「鉛水」問題？目前可謂眾說紛紜。畢竟，整個水務工程牽

涉諸多程序，同時亦涉及諸多人或機構，到底哪個環節釋出有毒毒物？不同人士應當負上什麼責任？凡此種種，實須要一個嚴謹、科學、準確的調查結果。可惜的是，在事情未有查明之前，社會輿論便已口誅筆伐，過早武斷地逐一批判各個嫌疑人及關聯者，當中並滲入挑撥兩地關係的「仇內」之、黨爭等元素，令問題政治化；此等有罪假定和人治公審的行為，無疑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也非解決鉛水事件的應有之舉。有見及此，專責小組誠須盡快查明原因，既還社會一個真相，也還涉事人一個公道；當中，如有違法情況，就必須嚴正地送官究治。

唯有找出病因，才能對症下藥。鉛水問題揭發之後，當局經已推出系列措施，包括提供水車臨時供水，以及安排受影響市民到醫院驗血等，均有效決定燃眉之急和解除公眾疑慮。然而，在查明真正原因之後，例如問題源自焊料的話，就必須全面檢查曾經使用有關焊料的建築物的供水質量，繼而針對更換該些不合格的水喉，唯有如此方可確保市民食水安全，以安衆心；反過來，如果只將錯誤歸咎於個別機構或人士，則不但無助解決問題，亦只會徒添公眾恐慌。如前所述，於此謠言漫天飛的情況下，多棟大廈供水系統均「疑似」出現問題，市民很容易杯弓蛇

影、聞水色變。究竟哪些水喉有問題？當局實須公開透明地提供信息，好像推出「懶人包」等好好解釋，當中並一併解釋飲用含鉛食水後會對人體產生什麼影響等，否則市民實難吃得安心。

亡羊補牢，加強日後監管，亦是防範問題再次出現的必由之路。一方面，立法機關有需要研究加強罰則，從而提高違法的阻嚇成分；例如，現時不符合焊接標準規定，最高刑罰只是罰款25000元，對比工程收益來說可謂九牛一毛，阻嚇力度實在令人質疑。另一方面，有關當局亦要加強執法，更好監督工程進行的各個環節，增加抽查檢驗不同

建築材料的質素等，杜絕任何可能出現的漏洞，如有違反行為必須依法處理，追究一切涉及的責任和賠償。與此同時，作為市民把關的重要一員，亦要釐清監管當局的角色和權責。

最後，鉛水問題當然茲事體大，不過一般倘非長期飲用，所受影響實非想像中嚴重，必要時可藉治療將鉛排出體外，市民並無必要過分恐慌，更要警惕不真確的輿論謠言；可是，有鑒這對幼兒及胎兒的影響卻是毋庸置疑的，食水含鉛肯定「一宗都嫌多」，所以相關單位必須汲取教訓，不容許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商報快評

本屆中學文憑試放榜，7.2萬中學生有2.5萬人考獲升讀大學資格，可是大學聯招學位僅1.3萬個，約半數苦讀十餘年的優秀學子湮沒，大部分人被迫無緣高等教育。延續港英殖民國教育政策，本港學子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一直維持約20%以下，遠低於發達地區及周邊都市的平均水平。整體知識水平低下，令經濟發展受長期人才「缺血」的制約，且大部分青年缺乏上流機遇，成為日趨嚴重「青年問題」主因之一。人才是本港唯一資源，大幅擴容資助學位令所有合資格學子均能接受高等教育，是興港之本。

資助學位嚴重不足

回歸以來，本港整體教育程度偏低，與社會發展需求嚴重脫節。雖然近年自資專上學額大幅提升，但在本港中、基層迅速貧窮化的現狀下，自資專上學位數年學費動輒數十萬，「含金量」又一直被業界質疑，沒多少家庭能夠或願意負擔。雖因人口老化等原因，近年本港應屆中學生數量逐年下降，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的學子比例微升，但仍只是由18%升至20%左右。與全球發達地區約70%以上的升學率相比略乎其後，也遠比內地城市近80%的升學率遜色。

整體人口高等教育程度偏低，對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公眾服務、青年競爭力等造成系列負面效應。由於有內地龐大市場支持，本港各項支柱產業獲充足發展，尤其金融業、會計、法律等知識型專業服務，成為本港最核心的經濟主導。然而這些中、高階產業均面臨嚴重人才荒，成為制約這些行業進一步擴容的主要因素之一。以金融業為例，今年金融發展局發布的金融業人力資源報告，顯示金融業面臨全面的人才短缺，所有受訪公司均表示在招攬和挽留經驗豐富的員工方面有困難。而剛畢業的學生則欠缺業界知識和軟技能，且普遍需要

改善語文水平、溝通和表達能力。這反映本港高等教育出現兩方面問題。一是學位太少造成長期性人才荒。二是學界和業界配合不足，不符業界要求。這其實也是大學學位供求嚴重失衡，以至大學「貴族化」不思改善的表現。又如造成本港醫學生長期嚴重短缺，以往令香港自豪的公眾醫療系統服務水準直線下降。市民看病輪候一天亦未必能接受診治，預約看病往往要提前一周甚至一年之久，情況已不能忍受。

後果十分嚴重

有言論認為港府實施的是「精英教育」制度，有助維持學術界領先地位。這其實與大學升學率風馬牛不相及。大學生數量的上升，並不代表就會出現質量的下降。反而只要嚴格管理，大學生基數的擴大可促成質量的躍升。香港對大學生素質有嚴格規範的控制，是本港大學能排名世界前列的原因。按香港法例，大學學位課程必須達至國際認可的水平，課程必須經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審核。大學必須得到國際認可的多範圍學科評審資格，須經由學術界人士和評審專家組成的評審小組評估大學對學位的評審能力。大學必須證明校內的學術環境和學術活動，適宜於持續開辦和持續發展學位課程，並制訂其效率的制度和程序，以控制和保證所舉辦課程的質素。須訂訂完善的內部管治架構，並通過行政及法律程序，成為一個受獨立法例規管的院校。只要依法嚴密監控學位核發的程序，寬進嚴出，只會助益本港學術水平的提升，而非相反。

中國人的普遍特點是努力勤奮，和平忍耐，然而有一個不能觸碰的「逆鱗」，那就是對子女培育和重視，這特點在港人身上尤為突出。早已不符香港實際需要的所謂「精英教育」制度仍在港奉行，令人吃驚而憤怒。

港事講場

鼓勵更多富戶退屋騰出單位

公屋需求和供應情況一直是政府及市民最關注的議題，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2011年申請公屋的數字編號為16萬個案，至今年2015年初，申請輪候公屋又合乎申請資格的人士就上升至26萬多，升幅達百分之三十多。以每年興建公屋15000至20000個單位計算，三年上屋計劃肯定不能兌現。如何紓緩申請公屋人士不斷飆升，希望盡快入住公屋訴求的願望，政府除了加快增加建屋土地增加建屋數量之外，還有什麼辦法來解決申請輪候公屋人士的上樓機會及時間，可謂煞費思量。

香港華人革新會副會長 文滿林

公屋富戶不是少數

記得在多年前，有學者建議政府增設搬遷津貼及特惠金措施鼓勵更多的公屋富戶退屋，有助輪候申請人士盡快上樓的機會。此一建議，直到今時今日，還是頗有吸引力和建設性，政府及有關部門不妨認真考慮。

在2011年時，房委會透露在過去三年收回達3萬至5萬個公屋單位數量的消息。這些收回公屋單位，有部分來自有經濟能力自置居屋或私樓的公屋租戶單位；也有公屋富戶自願退屋的；更有不少是繳交雙倍租金及差餉的支出，與購買居屋供款所付的金額相差不遠的住戶而放棄公屋單位的。據說每年達一萬數千宗。尤以2011年度「公屋富戶」自動退租就有770戶，比2008年及2009年度和2010年度多達一倍以上。

「公屋富戶」退租一年比一年多的現象，反映以下兩個因素。一是入住公屋，的確能令租戶家庭人士減輕不少負擔，改善生活，增加儲蓄。入住公屋日子越久，剩錢的機會就越大越多，直到覺得有能力可以調遷購買居屋改善居住環境的需要。二是部分住戶因得益入住公屋受惠較便宜的租金之「福利」，備有錢轉購居屋或私人樓宇，毅然作出主動自願退租，騰出公屋單位讓更多有需要的申請公屋人士盡快上樓入住，圓了人幫我我幫人的思想。然存有這種想法的人究竟有多少，普不普遍，當之很難估計，但從政府透露有關公屋富戶的調查數據來說，達到「富戶」的顯然不是少數。尤其是一些早年已經上樓的公屋住戶人士家庭，仔大女大出來工作，就是「富戶」的主要原因。上樓的日子越久(長)，成為富戶的成就就越大。

有利紓緩公屋供應問題

問題是，政府如何讓這為數不少的富戶主動退租搬遷，騰出更多的公屋單位讓有需要人士上樓入住。如何吸引更多「富戶」退租讓出單位，政府有必要實施多方面的實惠政策和措施，以及獎勵辦法，正所謂手上無把米，叫雞也不來，人家睬你都傻。如何吸引「富戶」退租退屋，就要多做一些「利誘」，例如對「富戶」退租退屋，就要增設一些特惠的優厚的搬遷津貼金額，之所謂「搬遷費」。二是對退租退屋人士給予一筆特惠金；又或者贈送一筆數萬元計的新樓裝修費，又或者凡是自動退租退屋人士給予(提供)一筆低息貸款資助，作出擔保及延長供款年期的優待。

所有這些，務必打動和吸引更多公屋「富戶」退租調遷，騰出更多的公屋單位出來讓有急切需要入住公屋人士上樓入住。由此推之，假若每年能吸引八千至一萬個「富戶」退租退屋，無疑可為政府增加額外的三分之一公屋單位，有助輪候入住公屋人士的等候時間，又可為政府節省不少資源以及建屋時間，可謂一舉多得。

當然，以上所說的「富戶」退租退屋情況，已是四年前的的事了，時至今時今日，究竟有沒有這麼多「富戶」退租退屋呢？那很難說，因為，四年前的樓價與現在已有一大段升幅。退屋買私樓的負擔比四年前的壓力更大，政府要讓「富戶」退租退屋，當然要付出更大的「利誘」和特惠才行，但，為了讓更多的「富戶」退屋騰出公屋單位，讓更多有需要輪候人士有機會上樓，更可減輕政府建屋用地和資源、時間，就算花費(付出)多一些特惠津貼，也屬上上之策，正是除弊有精也，最重要的是有利紓緩公屋供應問題。

港將成爲中外資本角力主戰場

經濟點評

本輪中國A股市場的暴跌，主要源於內地場外配资和融資槓桿泡沫的爆破，導火線正是證監會收緊場外配资和雙融的風險警示。要求6月30日前要嚴查清理場外配资和槓桿融資，導致6月26日A股的暴跌，演繹了有史以來股市崩潰的黑色星期五。雖然中國央行、財政部和證監機構之後連發多招救市維穩，如：6月28日的減息降準，7月6日的限制沽空，券商護盤和7月8日的央金拒減維持，部分股票暫停交易、擴充券商信用額度、放寬保險基金入市等強力舉措。但A股表現並未如預期的持續反彈，直搗4500點關。而僅延續了三日的千股涨停，滬綜指由低位3300多點，回升到4000點未能守穩，再次尋底，上演千股跌停。

內地資金有流入香港迹象

15日滬綜指再次由3900多點高位，回試了3700點的支撐。尾盤在金融、石油等護盤指標股的拉抬下，勉強收於3800點上方。顯示滬綜指4000點上方已構成短期頭部，壓力較大。

儘管證券監管機構將券商減持限制定位在4500點，但目前3900點至4000點之間已形成強大沽壓區間。多空雙方在此區域將展開

香港脈搏

借力「一帶一路」進軍跨境電商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李銜麟博士

香港回歸十八年，經濟看似穩健增長，但由於過度依賴金融地產等四大產業，實則停滯不前，找不到新的發展方向。反觀內地，近兩年民衆創業熱情高漲，再加上新一屆領導班子政策上的支持，令不少新興產業，特別是跨境電商產業如火如荼。國家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更是令內地工商界開始思考，如何透過新興產業，成為「一帶一路」的先行者及受益者。

上個月，本人同一眾工商界朋友，去東莞參加綠地集團主辦的「互聯網+大消費，共謀一帶一路」研討會，了解內地地產企業如何透過跨境電商產業，進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筆者此行收穫頗豐，今次就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首先，筆者非常佩服內地地產企業敢於探索新領域。綠地集團是世界五百強企業，亦是內地實力較強的地產公司。在內地經濟放緩，以及房地產不景氣的大背景下，選擇進軍跨境電商業，需要實力，更需要勇氣。同傳統零售業的運作模式不同，綠地集團選擇

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韓國建立海外商品直接採購中心，建立從生產、直接採購到直銷的全產業鏈。建立全球商品進口網絡和資源，為消費者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務，從而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產業質素和服務水準，可以說綠地集團開闢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跨境電商機遇無限

其次，筆者認為東莞發展跨境電商產業是正確的。曾幾何時，「世界工廠」是東莞的榮耀和驕傲。不過，隨着國家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過去的低端製造業已經不能滿足東莞乃至整個廣東省的發展需要。早前廣東省積極響應國家的「互聯網+」行動，出台措施，明確表示支持東莞以旅遊購物方式先行先試開展市場採購貿易，這為東莞發展跨境電商產業提供有力支撐。

除了政策上的優勢，東莞的地理優勢亦得天獨厚，西臨珠江口，與廣州、深圳、惠州接壤，距離香港及澳門的交通便捷，毗鄰籌建中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有利於

東莞透過發展跨境電商產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當前東莞亦正面臨產業升級轉型這一歷史性課題，發展跨境電商，可以更好地促進東莞加速產業升級轉型，利用跨境電商平台，發展珠三角企業的跨境出口業務，成為建設「一帶一路」的重要環節。

最後，筆者相信本港工商業可以積極利用東莞這個平台，搶佔「一帶一路」商機。日漸高企的倉儲成本令中小企業難以承受，而本港工商界可以依託東莞跨境電商平台，推動香港倉儲和物流業向東莞轉移。屆時不但能為珠三角地區的消費者提供跨境進口商品，亦能降低成本，拓寬進入內地市場的路徑，成為「一帶一路」參與者和實踐者。未來全港各區工商聯將攜手綠地集團，在東莞打造珠三角地區海外商品直供系統。筆者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本港工商界人士能夠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參與跨境電商產業，帶動香港經濟再次騰飛，為建設好「一帶一路」，促進國家更快更好發展再立新功！

專業之窗

培養學生語文能力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陳建強

教育局決定明年9月起的中學教學語言微調政策維持不變，亦即在第二個六年的微調周期內，當局不會因為學校的學生能力未能符合條件而要求學校即時修訂教學語言。換言之，「英中」不需要「落車」。事件引發教育界的熱議，更有議員作出政治化的聯想，但政策是死的，如何培養和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才是最應關注的事項。

多種語言共存成普遍現象

教育局在2010/11學年起實施教學語言微調政策，規定中一每班要有八成半學生屬於全港成績前列四成，才可以自行決定用英語授課。第一期的微調安排會實施至2015/16學年，明年9月起開始新一周期。然而，學生語文能力下降和適齡學童人口持續下降，令致全港約三分之一英中，在下學年面臨「落車」危機，當局決定教學語言微調暫不變，並將於未來數月派員到有需要的英中，與校方代表「進行專業討論」，以決定該校未來6年的語文政策，並為教師提供專業發展及研究項目等支援。

教學語言，也就是教師授課用的語言。一般情況下，教師會用社會上通用的語言授課，因而在課堂上聽到的、課本上用、公開考試考卷上用的，都應是同一語言。不過，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個國家，一種語言」的理想，與今天的實際，已經相去甚遠。多種語言共存的情況，已經成為普遍的全球現象。

在香港，自港英殖民地時期以來，香港就是一個重「英」輕「中」的社會，上世紀60年代教育界及有識之士發動中文運動，雖逼令港英政府於1974年把中文列為法定語文，但中英文地位有高低之別，現實未有改變。當中原因不止政治性，更因在二戰之後，國際經濟秩序以英美為首，英文既是經濟貿易、也是科學與學術的通用語言(lingua franca)，學生與家長以至學校都必須跟隨，形成一股要維持重「英」輕「中」趨勢的市場力量。

即使在香港回歸、中國崛起之後，原有的政治因素已經消失，但中英文共存、「中英夾雜」(mixed code)的社會語境未變，重

視英文的市場力量仍在；家長繼續要求學校多用英文，全英語教學最好，辦混合班亦「好過無」，而學校從收生考慮也得靈活回應市場需求。所以政府決定維持教學語言微調不變，讓部分英中得以保留，緩慢大批英中「落車」的震撼，並讓校方有更多時間總結經驗和提升語文教育質量，是一項務實而恰當的安排。

需指出，學習語言能力因人而異，即使是全開英文班的中學之中，亦有部分學生的英語能力稍遜，因此，教育當局或校方，無須一開始便以某種語文能力劃定的標準去把學生一刀切作語言分流，並由此形成中英對壘，這不利於香港作為雙語，甚至或兩文三語城市的發展。

相反，當局需為學校及家長提供足夠支援，讓有關學校在校內形成能夠促進學習英文的氣氛，再針對性地為協助英文能力較差的學生追上進度，多考獲兩至三分，變成達標。同時，亦要因應不同學科性質及其對語文的要求程度，設計一個符合學習目標、學生需要與能力的教學語言策略。